

# 重讀李榮春：論《祖國與同胞》的身分編輯與戰爭觀<sup>\*</sup>

吳明宗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摘要

本文以李榮春《祖國與同胞》為研究對象，討論文本中的「身分編輯」與「戰爭觀」。從「身分編輯」的角度，筆者以為文本為讀者展示了戰時台人在身分認同與個人目標之間的拉扯。在不同的考量下，每個人物都「選取」、「刪除」與「排列組合」了自己所需或是想迴避的部分，以自己覺得最適合同世人的樣貌出現，展露「認同」的複雜性。而從戰爭文學的角度來看，《祖國與同胞》雖然鮮少談及戰場上的拼鬥，卻對戰時中國社會與日本發動戰爭之心理有深刻且細膩的描寫。此外，李榮春對人物性格的多樣性以及二戰期間台人在身分上所面臨的尷尬處境亦有深入的書寫，這些都充分展現所謂「身分編輯」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抗日反戰的戰爭觀之外，作家尚從具左翼色彩的視野具體分析戰爭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使這部小說在同時期眾多作品中顯得獨樹一格。是故，透過重讀李榮春與《祖國與同胞》，筆者以為這部小說是兩岸從文學觀看抗戰歷史時，不可忽略且極具代表性的戰爭文學作品，其在台灣文學史上更留下了不容抹滅的宏偉身影。

關鍵詞：台灣文學、戰爭文學、身分編輯、祖國認同、抗日意識、左翼

---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並且提供具體且寶貴的修改意見，筆者獲益良多，在此致上最高謝意。稿件修訂後如尚有未盡人意之處，筆者當自負負責。此外，也要特別感謝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林芳玫教授在「身分編輯」概念上的啟發與討論，這對本文的寫作有關鍵的影響。

# Reread Li Rong-Chun:

## The Identity Editing and the View of War in *Motherland and Compatriots*

**Wu Ming-Tsung**

PhD Candidate

The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vel *Motherland and Compatriots* written by Li Rong-Chun, through focusing on two aspects: identity editing, and views of war. In the viewpoint of “identity editing,” this novel depicts how Taiwanese struggled in the dilemma between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ir own goal in the war period. Based on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each of the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selected”, “deleted”, “rearranged” what they needed or disliked, and they displayed the most suitable looks for their own; this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dentification.” Furthermore, in the viewpoint of war literature, Li Rong-Chun seldom mentioned about the fights on the war field but he profoundly and carefully depicted the status of China society and the intentions of why Japanese wanted to provoke the war. Besides, Li Rong-Chun also described about the diversity of identities and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s of Taiwa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se sufficiently show the conception of “identity editing.” On the other hand, Li Rong-Chun not only showed the attitude for anti-Japanese war, but also specifical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and imperialism from the view of left wing. This made the novel stand out from the works in the same period. Therefore, through rereading Li Rong-Chun and his work “*Motherland and Compatriots*,” this novel left its irreplaceable value in Cross-strait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es its grand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War Literature, Identity Editing, National Identity, Anti-Japanese Consciousness, Left Wing

# 重讀李榮春：論《祖國與同胞》的身分編輯與戰爭觀

## 一、前言

李榮春，1914年生於日治時期台灣宜蘭廳頭圍支廳（現宜蘭縣頭城鎮），卒於1994年，享壽81歲。1937年，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招募「農業義勇團」（後文簡稱「義勇團」），號召台灣青年赴日軍在中國的各個占領區進行農業試驗任務，李榮春毅然決然地參加招募。然而，李榮春並非為了響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相反的，他乃希望藉此機會逃往大後方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不過，直至1939年，李榮春皆未尋得前往大後方的機會，因而在契約到期後返回台灣。之後，李榮春先至日本半年，再轉往上海等地繼續探尋投入抗日戰爭的機會。重返中國的李榮春雖一心以參與抗戰為目標，卻始終未能如願。不過，使李氏稍感安慰的是，他終於還是見證了中國抗戰勝利的時刻。最後，李榮春於1946年回到台灣，並以文學作為其終生志業。<sup>1</sup>

1952年，李榮春以自身在中國的抗日戰爭經驗發表長篇小說《祖國與同胞》。這部80多萬字的鉅著以魯誠為主角，由他參與「義勇團」寫起，後以戰爭結束魯誠返台作結，當中多處投射出作家自己的身影。對於這樣一部完成於1950年代的作品，彭瑞金很早就公開呼籲應加以重視。其後，彭氏投入李榮春作品全集的編輯工作，使李氏三百萬言創作得以更多地讓讀者認識。或基於對李榮春的愛惜，彭瑞金在〈李榮春全集序〉中希望能還李榮春文學公道，序文開頭即寫道：「雖然這是極不應該有的現象，但李榮春仍是台灣文學史鮮為人知的作家。」<sup>2</sup>一語道盡彭氏對李榮春及其文學未能在文學史上取得一定地位而感到惋惜。

1 以上關於李榮春之生平部分，參見彭瑞金，〈李榮春全集序〉，李榮春著，彭瑞金主編，《李榮春全集1：祖國與同胞》（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12），頁2-3。

2 同註1，頁2。

隨著《李榮春全集》的出版，在進入21世紀後，相關研究也比之前要豐富得多，其中《祖國與同胞》更是論者較為關注的重點。有鑑於《祖國與同胞》濃厚的自傳性質，部分論者乃從文本與作家生命歷程之連繫展開研究。<sup>3</sup>此外，亦有研究者試從「大河小說」的角度分析該著，並與其它台灣大河小說進行比較、討論。<sup>4</sup>不過，目前學界對《祖國與同胞》最普遍的關注之處，仍環繞於其題名所指涉的概念，因而文本所呈顯的民族意識、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以及人文主義關懷，皆可散見於前人研究中。<sup>5</sup>2014年5月3日，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為李榮春舉辦了「李榮春百歲冥誕研討會」，會議發表的論文涵蓋其文學的多樣性、祖國認同、閩南喪葬文化等議題，為相關研究再拓新的思考。<sup>6</sup>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筆者思索的問題是：有別於其它台灣戰爭文學作品，如果要以《祖國與同胞》討論李榮春在台灣文學史的意義，那麼應如何更進一步地闡述其文學價值呢？

綜觀《祖國與同胞》，筆者認為李榮春乃是以「戰爭」做為貫穿全文的創作視角，因此實可由此視角對文本進行統整性的討論。事實上，在前人研究中，周介玲曾嘗試從戰爭的角度分析《祖國與同胞》，她當時注意到《祖國與同胞》曾一度由李榮春後人易名為《戰火浮生》。對此，周氏認為以《戰火浮生》為題更能凸顯文本描寫戰爭下人物心路歷程之用心。是故，周介玲在其學位論文提出了如下的研究目標：「在現有針對《祖國與同胞》提示的國家、民族及文化認同觀念所做的學術研究之外，本文將聚焦於文本另名《戰火浮生》

3 例如，在期刊方面有李麗玲，〈「真實與虛構」——從人物論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宜蘭文獻雜誌》31期（1998.01），頁3-14、唐毓麗，〈私小說的紀實與省思：談《祖國與同胞》、《海角歸人》與《洋樓芳夢》中的自我形象及愛情書寫〉，《文學台灣》92期（2014.10），頁196-235；學位論文方面則有吳淑娟，〈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4 例如，在期刊方面有褚昱志，〈台灣大河小說之先驅——試論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台灣文學評論》5卷3期（2005.07），頁84-100；學位論文則有陳凱筑，〈論李榮春及其小說〉（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5 例如，除了上述論文外，在期刊方面尚有丁世傑，〈回歸母土：論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台灣風物》59卷3期（2009.09），頁129-171；學位論文則有江靜怡，〈李榮春小說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周介玲，〈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6 詳見藍建春等，《李榮春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榮春百歲冥誕研討會」（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文學台灣基金會主辦，頭城李榮春文學館協辦，2014.05.03）。

所提示的『戰爭中的個人人生』，專注探討主角身處戰時戰地的個人追夢過程。」<sup>7</sup>不過，根據筆者閱讀後的理解，周介玲之所以引進戰爭的概念，乃是將其當作觀察文本人物性格與形象的濾鏡，目的是為了彰顯魯誠（或可說是李榮春）的藝術家性格，其研究貢獻乃在於將研究視野從前人所側重的「社會性」轉移到「個人」。然而，筆者並不同意戰爭下的「個人」與「社會」應該分開討論，這將會是筆者與周氏之間在引用「戰爭」視角做為研究框架時最大的差異。

作為一部以中國抗戰歷史為背景的小說，李榮春在《祖國與同胞》伊始寫道：

西元一九三八年——中華民國二十七年——那就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年春天。這時候，大地的一切應該更充滿著欣欣向榮的氣象；所有生命莫不想與自然更獲得一層深密的和諧的快樂，希望能更深奧地享受宇宙所顯示的，以及包羅在我們周遭的無盡的美麗、光明與和平。這原是一切生命，所一致而不斷地憧憬著的目標。本來要達到這目標，事實上並不見得怎麼困難；然而，偏偏人類卻又這麼愚劣地頑執於私慾和野心，終日侷促於自我的爭執與掠奪。結果一切生存幾乎都失了和諧的快樂，不免都在傾軋與虛偽裡，苦惱地毫無寧靜地混雜著過去；再不能享受片刻和平的安閑，領略生存的真實樂趣和意義。竟把生存本來合理的追求的目標：光明，真理與和平，當作一種空想；永無可能實現的虛妄。這真是令人浩嘆呢。<sup>8</sup>

在這段文字裡，李榮春並不急於展開他對日本的批評，而選擇從人性談起，他認為人性中的私慾與野心乃是一切爭奪的開始，這打破了原先由光明與和平構成的平衡狀態，甚至使其變得遙不可及，這便是戰爭的起源。正因如此，原先應該生意盎然的中國，在1938年盧溝橋事變後失去了應有的生機。回顧歷史，

7 周介玲，〈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頁22。

8 李榮春著、彭瑞金主編，《李榮春全集1：祖國與同胞》，頁18。以下引文出自此書皆於引文後標示頁碼。

近代中國受外國勢力侵略自然非始於1938年，因此李榮春之所以這麼寫，一方面是想將讀者召喚至抗日戰爭背景，另一個目的則是為後文鋪陳。由是，李榮春在上述引文的後頭緊接著寫道：「尤其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其淺薄無智的迷夢，自居征服的英雄，妄想君臨人類，以飽饜其侵略野心；更給萬般的生靈，帶來無限的黑暗，恐怖和摧殘。其所表演的種種野蠻、殘暴、罪惡和無恥的極致，更給人類的歷史添下無可抹滅的污點。」（頁18）可以說，李榮春在小說開頭便對1937年起日本在中國發動的全面侵略行為提出沉重的批評，也試從戰爭的本質反思這場源自人類私慾的悲劇，奠定文本以戰爭做為視角的寫作色彩。

於是，在戰爭的視角下，文本事實上隱含許多作家投注其中的「戰爭觀」。與同時期由台灣外省籍作家寫作之戰爭文學作品不同的是，作家的戰爭觀因為涵蓋了台灣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因而在寫作上成為一道不同的風景。並且，李榮春在小說中所展露的戰爭觀亦極富層次，以「戰爭」為視角，他看到了中華民族受日本侵略之痛苦，也揭露日本以建設大東亞為名發動戰爭的兩面手法，更留意到戰爭與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關係。在這之中，既有他對中國的祖國認同而發展出的民族視野，亦有就戰爭的本質以及日本發動戰爭的心理加以剖析的部分。此外，作家對戰時中國社會的關懷亦帶有一定的左翼色彩。

另一方面，文本中的戰爭觀又與魯誠等人源自殖民地台灣的身分背景以及到中國後的人生際遇息息相關。因此，李榮春在文中並不願意以單面向的國族認同來形塑人物形象，而是力求呈顯當時台人在面對自我身分時的多重考慮。關於這點，使筆者想到林芳玫在〈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所提出的「身分編輯」概念。林氏在其論文指出，長期以來學界從事台灣日治時期文學研究時往往預設兩大框架，一是書寫者是否抗日？另外則是書寫者的文化或國族認同為何？對此，林氏認為在這兩大預設框架下，相關研究實難再有新的成果。部分學者雖試著引用混雜（hybridity）的概念，有意拋棄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論述模式，然其實際上仍預設了二種或兩種以上的「實體認同」。於是，林氏提出「身分編輯」的概念，其構想如下：

本文以非關認同的立場出發，提出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的概念。跨文化與多元文化不同，後者假設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許多各自不同的文化，由彼此的外部差異來強化單一文化自身內部的同質性。而跨文化性則認為文化本身就內建了差異，不同文化之間也形成動態的網路。塑造個人身分認同越來越像是把不同文化的組合要素經由選取、刪除、排列組合而編輯成符合當下需要的「布局」（configuration）。這些多重的跨文化網路就算有相同的組成要素，仍是以不同的方式放入儲藏清單（inventory），因而導致不同的結構。<sup>9</sup>

基於上述想法，林芳玫強調其研究對象謝雪漁實乃在「跨文化」脈絡下進行「身分編輯」，以此回應過去那種奠基於「反抗」與否的論述形式。

受林芳玫論文啟發，筆者認為「身分編輯」的概念亦可用於分析李榮春以及《祖國與同胞》中的人物。不過，與林氏不同的是，其論文更多強調的是作者謝雪漁本身如何透過創作來達成自身的身分編輯；而本文探討的則是《祖國與同胞》中各文本人物的身分編輯，當然，由於這是一部自傳性質很高的小說，這樣的探討（尤其是魯誠的部分）自然也會反映到李榮春自己的經歷。另外，有別於林氏從「跨文化」的視角提出論述，筆者站在「戰爭文學」的角度認為，這些人物進行「選取」、「刪除」與「排列組合」的考量，除了與自身出自殖民地台灣背景相關外，文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亦是左右人物行動的重要因素。透過適當的「身分編輯」，文本人物在戰火下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構成自身面對外界的身分，而其中蘊含的多重考量，使得這些人物在認同上不再只是單純抗日／媚日這樣二元對立的決絕態度，形象也因此多樣而豐富，充分體現人類思考的複雜性。同時，人物在各時期思考的變化，亦說明「編輯」是個動態的過程，因而隨著個人際遇的不同，這些人物也隨時動態地編輯自己的身分。

筆者以為，在這部小說中，「身分編輯」與「戰爭觀」兩者存在一種互為

---

9 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雄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23期（2013.12），頁34-35。

因果的關係。<sup>10</sup>一方面，「戰爭觀」作為《祖國與同胞》不容忽略的一部份，是文本人物從事身分編輯的重要考量之一，直接或間接地左右了「編輯」的結果；另一方面，基於「身分編輯」的動態性質，當編輯過的身分與新的人生際遇相結合，也會影響到後續「戰爭觀」的建立。這點也說明，多數情況下，人們戰爭觀的生成，以及對戰爭的認識，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進展。是故，由「身分編輯」與「戰爭觀」著眼，筆者將順著文本中戰爭發展的時間軸展開對《祖國與同胞》的重讀工作，以此分析文本人物在不同時期對於自我身分的考慮。

## 二、「義勇團」時期：赴中的多重想像與幻滅

1894年，中日因朝鮮局勢爆發甲午戰爭，最終，歷經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戰勝清廷，雙方於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決議將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割讓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作為殖民地，台人與日人之間存在許多不平等關係，這點亦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品常見的主題。李榮春既生於日治時期，對此不平等現象自多有體會，因而，觀察他在《祖國與同胞》的陳述，讀者不難發現，其筆下的台人對自身命運多有怨懟。比如，林矣平自幼喪父，他在母親改嫁後投靠叔父，卻沒想到叔父嗜賭，所以林矣平只得在小學畢業後就待在學校裡為老師們挑水、劈柴、當雜差。命運之不幸使林矣平感嘆萬千，在其心中更有「假如我要不是一個台灣青年，那末，定會更有作為了吧」（頁23）的想法。為何林矣平會有這般想法？李榮春在後頭寫道：「原來他們<sup>11</sup>都是殖民地的奴隸，被那征服的民族當為卑劣而該受榨取的對象；永遠要被壓迫下去，過著奴役的生涯。所以他對自己的命運是最感不滿的。」（頁23）在此環境下，林矣平也不禁埋怨：「台灣人在台灣除了當奴隸，再沒有辦法了」（頁23）

是故，在台灣受壓迫的經驗促成了台灣青年日後進行身分編輯的潛在動力，而「義勇團」的招募恰好提供了他們這樣一個履行的機會。於是，當日軍

10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此想法。

11 筆者註：即指台人。

在台灣招募赴中國開墾農場的「義勇團」，並且允諾任務期滿後可在當地除隊，文本中的台灣青年莫不抓緊機會加入行列。然而，這些青年並非為了「勇士」之名赴陸，而是為了擺脫自身在台灣之命運而行，李榮春如此描寫這群青年：「個個都具有一副頑壯倔強的體魄。卻不都是純粹的農村青年，有許多實際上對於種植，並沒有絲毫經驗，大體都是掙扎著，為欲擺脫被壓制的命運，逃出無處伸展底奴隸境界。」（頁20）因此，在看似響應日本侵略行為的表象下，實則蘊含著擺脫奴隸般的命運、反日意識以及對中國的祖國認同等多種考量，而「義勇團」的工作只是一種偽裝，是用以當作完成其它目標的跳板。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義勇團」這項看似呼應日本國策的工作才被放進了青年們「身分編輯」的儲存清單中。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在進行「身分編輯」時，這群台灣青年都想到了有條件地使用「義勇團」的身分，但是由於每個人心中所重之處不同（例如，魯誠是站在對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式的祖國認同；王也禮與林矣平則較純粹地想擺脫在台灣受壓迫的處境；廖中和這類人物希望藉此在返鄉後成為御用紳士者），最終還是產生了不同的「編輯」結果，「義勇團」成員各自迥異的人物形象也因此躍然紙上。

於是，透過對「義勇團」青年心理活動的剖析，作家向讀者展示了此時期文本人物「身分編輯」的組成，同時也對他們的戰爭觀有所陳述。例如，除了前述的林矣平外，王也禮一踏上中國土地便說：「這時我們台灣青年，只得跑到大陸開發自己的命運了，從此大陸便是我們的第二故鄉。在家鄉我們過一生都沒有辦法，永遠是沒有我們的機會的……」（頁25）足見他當時在身分編輯的考量與林矣平較為相近。此外，在「義勇團」中，試圖藉由登陸中國改變自身命運並以此達成身分編輯效果的不只是台灣青年，更包含了日人幹部。在李榮春筆下，擔任各州隊小隊長的皆為日人，在他們之中，除了第一小隊長外，第二小隊長瞎了隻眼、第三小隊長眼瞼已經爛到睜不大眼睛，第四小隊長則癱了一條腿。然而，這些人卻因為日人身分而在團體中享有不同待遇。對此，李榮春寫道：

這些四不像，殘廢的人類滓渣，原先他們也都是班員。事實上想做一個

健兒，這些先天的缺陷，根本已無法彌補。讓他們這些參加這團體，本來就未免有諷刺的意味，然而卻因這些人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居然也能沐浴征服的民族國家的光榮。所以雖然他們都是四不像卻依然是優越的，比較這些殖民地奴隸，當然要優秀而且高貴得多了。（頁41）

於此，或許李榮春想要強調的仍是所謂的日台差異。但是筆者看到的細節是，這群身帶殘疾的日人，他們在日本國內甚至是殖民地台灣，原是一群不會被特別重視的人。因而誠如台灣青年那般，這群日人看到了登陸中國後的願景，所以把握機會攀附其母國在中國的侵略勢力編輯自身身分，在看似愛國的行為下，實乃同樣隱藏著一顆試圖改變命運的心。然而，與魯誠等台灣青年不同的是，這群日人在原社會受到的壓力不在於殖民體制，而在於自身的殘疾。而這些日人對改變自身命運的期待乃是建構在對中國的侵略之上，這點也與魯誠等人大相逕庭。

從「義勇團」中的日台差異，筆者認為李榮春亦提供了一次說明何謂身分編輯的動態性的機會。文中的台灣青年眼見自己必須被這些明顯能力不足的日人管理，再加上小隊長們動不動就以軍律要求絕對服從，這使他們極度不滿，同時更發現自己的命運並未隨著到了中國就產生改變，因而李榮春寫道：「（台灣青年）也更清楚的瞧穿征服者的真面目，為血統的不同，為被征服，他們要永遠被當作奴隸看待，被歧視和壓迫，再不能獲得做人的尊嚴和應有的價值。這一切在征服者的鞭笞下，他們的存在永被否認，決不再有出頭的機會。」（頁42）由是，這群青年們開始怠忽農場工作，並將其視為一種消極的抗日行為。是故，最初台灣青年乃是從「義勇團」的招募看到某種編輯自我身分的可能性。但是在農場的現實告訴他們，所謂「義勇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像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像，於是他們立刻著眼於手邊的資源，重新編輯自我身分，以一種得過且過的方式面對「義勇團」的工作。另一方面，這些青年雖未如魯誠那般對中國有強烈的祖國認同，但從一些表現仍可看出他們心中隱微的認同基礎。例如，小說提到在魯誠等人負責開墾的農場裡住著一位老人，其妻兒在日軍攻陷南京時皆失去性命，這位老人便孤苦伶仃地生活著。然而，日軍卻

下令驅逐原先住在農場裡包含老人在內的中國人，剝奪他們最後能夠安身立命的處所。不過，魯誠等人並未遵守日軍的命令，利用「義勇團」的身分之便，他們非但沒有趕走老人，甚至還提供糧食並拿出部分薪餉資助老人。到了冬天，老人則每天燒熱水供魯誠等人洗梳，也會準備茶水給他們飲用。原先互不相識的老人與魯誠等人，因為戰爭相遇，也由於同被壓迫的身分相知相惜，這固然是出自一種同胞之間的關懷，卻也不失為一種出自階級視野的團結，展現了受壓迫階級的抵抗力量。

至於魯誠，他作為作家在小說中的化身，承載著李榮春當初欲藉由參加「義勇團」進而投入抗戰的決心。因而讀者可發現，在眾人之中，魯誠的抗日意識以及對中國的祖國認同最為強烈。作家在文中特別提到，魯誠及其兄弟在台灣原是接受學堂傳統教育，改受日本教育後，因他心中早已奠定強烈的中國民族意識，因而在排斥心理下反而成績最差。之後，魯誠又受到蔣渭水的影響，加上其二哥總與他分享關於中國的情形，因此他對中國形成一股難以言表的祖國情懷。可以說，源自台灣的壓迫經驗，加上對中國無比的崇愛，使得魯誠在抗日戰爭中展現了與他人截然不同的堅毅態度。「戰爭」更使魯誠的抗日意識與對中國的祖國認同產生實際連結，使他體悟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只是侵略中國的第一步，而大東亞戰爭則是日本正式展露併吞中國之野心，因此台灣作為殖民地的苦，實應與中國受日本侵襲相結合起來。基於此想法，魯誠自然有著與其他台灣青年不同的抗日視野。是故，當其他青年為求脫離奴隸命運加入「義勇團」時，李榮春乃是如此描寫魯誠的動機：

（魯誠）對於農作卻是未曾有過的經驗，只因不滿異族的壓迫，從小就憧憬祖國，眷懷祖國，整日歡喜獨自沉浸於冥想裡。跟著年紀的長大，智力的啟發，這種天性使越發強烈起來。尤其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在寢夢裡都想要奔回祖國，希望能為苦難的祖國，參與著一份的奮鬥。  
（頁24）

於是，當魯誠一踏上中國，看到祖國因戰亂而滿目瘡痍的景像，他便在心裡宣

誓：「為著祖國的生存，為著真理和光明的追求，我已第一步，要開始做殊死的搏鬥了！我以誓死的決心，要和這侵略、野蠻、殘暴搏鬥到底！決不退轉！決不退縮！為貫徹這理念，就使犧牲生命和一切，都是無所謂顧惜的。」（頁24）並且，對於中國的愛使魯誠每到一地便為其受侵略的命運感到揪心，例如，在中山陵前，魯誠看到盡是日本軍官前來遊覽，而不見任何中國人。那些日本軍官都想與中山陵拍照，再將照片寄回日本國內，好向親友炫耀自己侵略中國的雄姿。這景象不禁讓魯誠感到悲痛，因而李榮春寫道：「（魯誠）此刻站在這陵前，便更感覺自己對於祖國的深刻的愛，並且更感悟自己的性命，那是只有為祖國的愛，為祖國奮鬥而生存著的。」（頁63）可以見得，魯誠幾乎是把自己的生命同中國之命運綁在一起，因而其思考無不以祖國為優先，這便影響到他編輯身分時的考量。

於是，當魯誠在編輯自己身分時，對中國的祖國認同始終擺在第一位，因而在人物形象的光譜上，他在國族認同的表現上顯得最為耀眼。亦是因為抱持著這股抗日決心，當眾人一心以回到中國發展個人前途為目標時，魯誠卻提出與眾不同的想法，其言：「我並不希望發什麼財。只一瞧那侵略者這般驕橫殘暴，我便覺得很悲憤！我們都是中國人，尤其是台灣同胞，更嚐盡被壓迫的痛苦和恥辱！無論怎麼樣，我們的青年都要振奮起來，和侵略者搏鬥到底！除此之外大家再沒希望解脫的可能」（頁58）是故，相較於王也禮等人對個人的關注，魯誠認為個人仍需依附在國家之下，唯有活在一個強盛免於被侵略的國家，人民才有個人發展的可能性，因而理應以幫助中國擊退日本為首要任務。所以當魯誠聽到其他人認為個人在戰爭中起不了作用時，他未免慷慨激昂起來，他希望同胞們可以在抗日戰爭中團結起來，建設更富強的中國，其言：「我希望這次的不幸，能更徹底使我們的民族發奮起來！能更勇猛驚醒團結起來！領土雖被蹂躪，只要靈魂不屈，誓死雪恥復國奮鬥到底！把五千多年歷史考驗的蘊蓄，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命和精力量，打成一片，一起發揮出來！」（頁60）因此，魯誠一方面由於殖民地經驗而身懷抗日意識，另一方面也基於對祖國的憧憬而始終對中國充滿美好想像，他雖然也將希望放在祖國中國，思考的卻不是個人的未來發展，而是如何為受難中的祖國盡一分心力，這

便是他在文本中作為典型人物的特殊性。<sup>12</sup>

另一方面，主人公魯誠很大程度地也反映了李榮春對戰爭的見解，因此文中多數對於戰爭的分析都出自魯誠之口。例如，林矣平曾向魯誠等人提到走到日軍墓林的經驗。在那一次，林矣平緊接著又走到了一條戰壕，那裡不僅有股難受的氣味，更有許多肥碩的烏鴉貪婪地盤旋著。接著，映入林矣平眼簾的是如下的景像：

只見壕裡還蓄些水，橫七豎八地倒疊著無數戰屍，盡是中國兵。這些死體都是生前對日軍抵抗到底的烈士們，不過，已經腐爛泡脹，難看得很；那許多形狀實在無法形容得出，看起來又真可怕。有了斷了腳，有的胳膊不見了，也有四肢全部潰解。側著臉的，仰臥著的，也有伏著的，扭歪著頭咬緊著嘴的，有的好像在瞪著眼，獠牙露齒，真不敢再走下去。有的連鼻子都沒有了，五官也再分辨不清了……多麼殘忍的戰爭啊。（頁37-38）

顯然，與陣亡的侵略者相比，林矣平認為在戰爭中死亡的中國士兵之命運更令人不勝唏噓。魯誠在聽到這番陳述後，腦海不禁浮現曝屍露骨的中國士兵以及日軍整齊的墓碑。對魯誠而言，後者是一種虛偽造作，目的在於掩飾侵略者暴戾的本性，以求扭轉其自身在歷史的定位。然而魯誠認為日軍這麼做這是無用的，因為「任憑一個侵略的野心家，怎樣猖獗一時，在歷史之前，便永遠是個無可赦宥的罪犯！囚徒！」（頁38）從戰爭的高度，李榮春固然對於交戰雙方戰亡士兵抱以同情，但是站在中國是受侵略一方之立場，以及對照中國士兵與日軍在身亡後的待遇，其仍不禁透過魯誠表達悲憤不滿之情。於是，對於日本國內將戰亡的將士當成舉國崇拜的英雄，魯誠更是感到不屑。因而當魯誠看到

---

12 關於盧卡奇對「典型人物」之看法，劉昌元在評介其文藝思想時指出：「典型人物的作用在反映社會整體或那些普遍的、重大的與互相衝突的社會力量。典型人物既非只具殊性，不具共性，亦非只具共性，不具殊性，而是兼具殊性與共性。」因此，典型人物註定不能只是性格一般的普通人，而有其虛構、極端化的性質。不過，「雖然典型人物有以上特性，但他們並非只是受到社會力量支配的木偶。他們可有自己的性格與思想，而且他們的命運是在自己的性格、思想與他人及環境的互動中織成的。」參見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12），頁128-129。

日人前往參拜一二八事變中的「肉彈三勇士」時，他覺得日人這種英雄崇拜，甚至爭相當「英雄」的舉動是相當無知愚劣的行為，因為「他們從未曾考慮過自己國家為什麼要侵略中國，而只甘願做為罪大惡極的工具罷了。」（頁39）

綜上所述，觀筆者認為這群「義勇團」青年的外在與心理活動呈現多重複雜性。他們雖打著日軍的旗幟前往中國，但是在看似援日的行動下卻流淌著反日的心理。不過，在李榮春筆下，王也禮等人雖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祖國認同，然而這種認同似乎更多的出自對個人發展的考量，而非大我層次的民族大義。當然，在他們從事身分編輯的過程中必然存在外界干擾，這一方面說明身分編輯的動態性，另一方面也表示人們在面對自己的身分時，本是一段連續不斷的抉擇過程，每次做出決定時都有不同的考量，因而接受或拒絕皆有其理由，並且造就出不同的身分面向世人。例如，文中寫到，當「義勇團」一踏上中國土地，日人便領著台灣青年唱起團歌：

磨け玲瓏日本精神，（磨呀玲瓏日本精神，）  
我等は台農一千健兒。（我們就是台農一千健兒。）  
黎明きざす中國踏めば，（踏上了這已現黎明的中國，）  
胸は高鳴，血潮は躍る。（希望高張，熱血奔騰。）（頁20）

然而對於林矣平而言，他覺得這歌詞太過好笑而不想唱，他說：「嘿嘿，唱這團歌，那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那有什麼日本精神？」（頁21）可以看到，林矣平此刻的選擇是不屑於唱團歌，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在那當下對自己身分編輯的抉擇乃是以「國族認同」為考慮。但是，是否應該就此把他定調成標準中國民族主義下的抗日愛國青年？筆者以為應該再與他日後重返中國，並且依附在日軍勢力下經營生意於一起討論。<sup>13</sup>

另一方面，林矣平的話，無疑也反映了作者李榮春對日本的不屑，顯示出他心中對中國的祖國認同。於是，李榮春繼續在文中進行他的嘲諷，他安排台北州隊的日人隊長神色緊張地向台灣青年宣佈：「（如今）已是遠離了我們的

13 關於這部分的討論，筆者將在第三節分析。

祖國——日本——到這戰地來了！」（頁28）但是，這名日人隊長在說到「祖國」二字時，卻瞬間感到一陣空虛與虛偽，「因為所有的班員的真正的祖國卻是這被侵略的中國。」（頁29）佛斯特（E. M. Forster）在論小說創作中的人物時提到：「小說人物是可以讓讀者完全瞭解的，只要作者願意的話，他們的內在生活就會像外在生活一樣，讓人一覽無遺。這也就是他們通常比歷史人物，甚至比我們周遭的朋友更加具體明確的原因。」<sup>14</sup>是故，透過這番描述，李榮春從文學的角度讓讀者看到日人作為侵略者也有心虛、害怕的一面，他們尤其擔心台人與中國人民之間的血緣關係會聯合成一股反撲的力量，所顯示的是日人對自身「祖國」教育的不自信與懷疑。

或因日人的不自信，他們擔心如果讓這群台灣青年留在中國，恐怕會成為中國軍隊的助力。於是，讓台灣青年夢碎的消息傳來，日軍並未依照當初的公告讓「義勇團」成員在任務期滿後就地除隊，而要把他們再送回台灣去。對此，林矣平悲痛地說：「難道我們只得長期關在台灣當奴隸！？嘿嘿，一念及此，我便又感到人生的黑暗，前途的無望。那時剛到中國的興奮和那股熱烈的希望，什麼理想呀抱負呀，已變得水泡似的幻滅了。」（頁53）於此，林矣平看到的是這段時間內的身分編輯終將回到原點。然而，林矣平心中的那股動力並未就此消失，因而他積極想要尋得其它可能性。於是，林矣平希望一回到台灣後一定要再想辦法到中國。對於林矣平的提議，王也禮也表示贊同，其言：「無論怎麼樣台灣青年，要到大陸來才有辦法，如果住在台灣可真太可憐了。日本人對我們這般差別待遇，有什麼機會都被他們獨占。台灣人住在台灣除了當苦力，別的再沒得辦法想。」（頁55）可見，編輯動力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因素，唯有動力不滅，人們才會不斷探尋編輯的可能性，以致源源不斷地進行著身分編輯的工作。

論及回去台灣，林矣平對當時已開始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揶揄了一番。他認為台灣那些御用紳士配合改日本姓名、組織國語家庭，一切就像是場鬧劇，最後的目的還是要台人去當砲灰。為此，王也禮則說自己絕不願意成為砲

---

14 E. M. Forster（佛斯特）著，蘇希亞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商周出版社，2009.01），頁71。

灰，並提醒眾人一回到台灣一定要抓緊時間再到中國，要不然可能會很危險。從這些對話，我們可看到，一方面過去在台灣受差別待遇之記憶深深烙印在這些青年的腦海裡，另一方面他們也察覺日本欲利用台人參與戰爭的意圖，因而台灣原是他們的家鄉，如今卻成為再怎樣也不想回去久待之處。透過對家鄉的種種顧忌，李榮春寫出了台灣青年們有家歸不得的悲哀心理，是故他在文中借王也禮之口寫道：「我們是沒有家鄉，我們是給人家趕出來的。我們不願當奴隸，家鄉就住不來。我們是吉普西，東亞的猶太，從此我們只得過著流浪的生涯！」（頁55）而文本人物這種對家鄉的矛盾感情，不也是一種身分編輯的過程？他們熱愛台灣，卻不喜歡盤踞島嶼的日本殖民體制；他們想回台灣，卻擔心受到戰火波及。於是，在各種拉扯下，他們只得以「東亞的猶太」來定位自身的身分，這當中在身分編輯上面臨的考量與掙扎，斷非單純的國族認同所能決定，突顯出林芳玫提出「身分編輯」概念時的核心思考。<sup>15</sup>

### 三、壽縣與紹興時期：戰爭的再認識與身分重鑄

上節提到，「義勇團」青年原想藉機到中國另尋發展，無奈夢碎。然而他們並不放棄，最終還是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在王也禮的部分，前文提到他始終將中國當作擺脫奴隸身分與發展個人事業的新天地，因而當他在得知日軍還是要將「義勇團」成員送回台灣時，馬上向眾人宣布他一定要再回到中國。然而，王也禮並非想回中國參與抗戰，他向夥伴表示自己要在中國發展實業，其甚至直言：「哪個地方能給我們發財的機會，哪就是我們的家鄉。」（頁56）此話雖然市儈，卻忠實地反映當時某些台人的祖國認同基礎。後來，王也禮再次回到中國後便以「日僑」身分在安徽壽縣辦起洋行，並與日軍有生意上的往來。倘若以二元對立的方式進行書寫，則王也禮的行為必定被歸為反面人物，成為作者致力批評的對象。不過，李榮春並未如此處理，相反地，他雖寫王也禮為了發展個人事業親近日軍，卻也在多處書寫王也禮對日本的嘲諷

15 從「跨文化」的視角切入，林芳玫認為謝雪漁〈日華英雄傳〉中的人物事實上是「在日／華、傳統／現代、東洋／西洋多重文化之間的空間(in-between spaces)編輯當下的身分」。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雄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23期，頁34。

以及希望戰爭早日結束的心願。例如，對於日本虛報戰果，事實上卻難以征服中國，王也禮笑道：「如今，日本人都劇痛著，傷腦筋了。到底，才曉得要征服中國，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一回事。不免正懊悔著。」（頁74-75）可見，王也禮雖然依附在日軍勢力下做生意，卻絲毫不是站在日軍的立場看待戰爭。同時，隨著戰事的推移，王也禮也對戰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不過，作為一般人物，王也禮自然不可能像魯誠那樣具有洞悉一切的能力，這卻恰好反映當時一般人對於時局的一知半解。例如，日人曾向王也禮說日後世界有色人種將與白色人種發生大戰，為此日本有團結亞洲各人種的使命，這樣才能使東亞免於當奴隸的命運。對此，王也禮便無法識破這是日本掩飾侵略行為的話術。然而，若從民族情感出發，王也禮的反日意識就較為清晰。比如，談到日軍向他表示犧牲一個日本人要比犧牲一百個中國人更可惜時，王也禮向其他人表示：「他們都這般優越，歧視中國人，虐待中國人，把中國人當作奴隸看待，這種仇恨，中國人怎麼會得把它忘記了呢！」（頁85）或許，正因心中有一定程度的祖國認同支撐，王也禮自身雖從未實際參與抗日活動，卻無條件地支持作為抗日青年的魯誠。

在王也禮的邀請下，回到中國的林矣平也加入了洋行的經營。不過，如同王也禮那般，林矣平亦有顆隱藏的反日之心，這點從他私下多次批評日軍侵略行為便可發現。例如，前文提到，當林矣平還在「義勇團」的時候，他曾去過一個插滿木牌的荒野，木牌上都是陣亡日軍的名字。林矣平後來向同伴們轉述這段經歷時說道：「這許多勇士都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炮灰，只在一夜之間盡變做戰場之鬼了，性命永遠消滅了，想起來真可憐喲！嘿，嘿嘿。」（頁37）以「炮灰」形容陣亡的日本士兵，林矣平言語中不無諷刺之意，卻也透露對人類在戰爭下犧牲的無奈。筆者之所以回顧這一段經歷，主要想說明，人對戰爭的認識乃是累進。在林矣平的例子裡，最先是源自在台灣受壓迫的經驗，再來是「義勇團」期間親眼見證日軍對中國侵略的慘況，終將林矣平推向站在中國的立場看待這場戰爭的視角。於是，當他再度回到中國，聽到魯誠向他眉飛色舞地陳述上海地下抗日人員如何炸毀日軍汽車時，林矣平也不禁插嘴笑道：「喲，那末，他的英靈只得飄飄飛回靖國神社，享受萬世不休的香火，從此永

得日本民族虔誠的默禱了。嘿，嘿嘿。」（頁130）此語充滿揶揄的意味。由此可見，除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滿外，林矣平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舉動也相當不以為然。因此，雖然自身缺乏投身抗日活動的行動力，林矣平卻十分支持著魯誠的抗日行為。當魯誠為自己總依附著朋友過生活而感到惶恐時，林矣平明確地告訴他，自己與王也禮很能理解其崇高的目標，其言：「我希望你能夠在這安靜的環境，只管繼續用功研究學問。我們都祈願你將來偉大的成就，如此同志也一樣會感到光榮的。」（頁197）是故，儘管林矣平與王也禮不曾表達過投入抗日工作想法，卻將希望擺在了魯誠身上，這也造就了魯誠在文本中的抗日光環。筆者以為，相較於主人公魯誠，王也禮以及林矣平隱晦的抗日意識反而呈顯了人性的複雜性，使人物形象更為立體。這種複雜性若從單純的「抗日／親日」二元對立式的視角觀看，恐怕就不易體現。然而，透過「身分編輯」的概念就能較清楚的看到在表象下的諸多細節，說明一個人的身分從來就是多維度而無法從單面向加以定位。

而即便是從抗日意識來分，若王也禮與林矣平代表的是抗日意識較不明顯的台人；魯誠代表的是具強烈抗日意識台人；那麼在文本中屬於投機派的柳君亦有其複雜性。柳君亦是在參加「義勇團」時結識王也禮，再次回到中國後因始終找不到發展機會，最後認為只有跟日本占領軍有密切合作，才能在中國有所作為，於是便在日本軍部擔任通譯，跟隨日軍進行掃蕩，並藉此之便邀請王也禮一同經營洋行。為了個人發展，柳君忘卻自己的被殖民者身分，反而在中國協助殖民者進行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呈現認同價值上的錯亂，也註定成為李榮春筆下的負面人物。由是，李榮春在描寫魯誠首次看到柳君時如此寫道：「這些嚐盡了幾十年奴隸的屈辱生涯，如今回到中國，不知反本求源，發憤覺悟，倒要學起日本人來了，多麼趨炎附勢的無恥之徒。」（頁170）此外，為了突顯柳君的投機性格，李榮春還寫其為了在中國社會做生意，因而故意穿長袍接觸中國人，以此表示親善；但是若必須與日本軍部接洽時，他又會穿起那套草綠色的日本戰時國民服裝。事實上，這種換裝行為不正是身分編輯的具體表現？說明人們懂得在不同狀況下，藉由「編輯」，形塑出對自己最有利的身分。

另一方面，像柳君這樣一位投機分子看到看到整日讀書而不關心事業的魯誠，其心裡也充滿不屑，「他認為這種人毫無青年的智慧，也沒有一點兒熱情以求進取，既不明瞭時代，又不認識現實的趨勢，如此也想跑到中國來，還有什麼意思。」（頁191）兩相對比之下，一位是一心以抗日為首務的愛國青年，一位則是短視近利卻又自以為聰明的投機者，藉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李榮春試對那些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一己之私與日軍合作的投機者提出批判。不過，即便是這樣的投機派，在其內心多少仍有其民族情感，因而當柳君聽到林矣平神色黯然而說有兩名士兵為了炫耀自己的日本刀，於是隨意殺了兩個中國人，他立刻表示：

當我們還在台灣的時候，雖則讀著那些日本雜誌，都說，皇軍是怎麼樣和中國老百姓親善，還畫著日本兵抱著中國小孩，或同他們在一塊兒玩。那時，我們也會想做日本兵是人道的，有著憐憫心的。事實，卻只是宣傳得這麼好，假如，我們要不到這中國來，卻怎麼會曉得日本兵，到底殘暴得這樣子呢。（頁86）

為了自身利益不惜為日軍擔任通譯的柳君在聽完林矣平的話後，竟會說出這些話，可見殖民地經驗還是深深烙印在其心裡，對於日軍在中國的侵略行為其也並非全然無動於衷。並且，在中國的見聞也改變了柳君對日軍的認識，然而與個人利益相比，此一認識還不足以動搖他對人生的選擇，所以才會以一種趨炎附勢的形象亮相。於此，李榮春再次展現了其刻劃人性複雜度的功力。

而除了描寫台人外，李榮春也有意識的描寫中國人民在戰爭中的抗日表現，例如擔任日軍通譯的柳君便曾告訴眾人，中國老百姓一點也不願意向日軍透露中國兵的蹤跡。筆者於前文也提到魯誠曾向林矣平訴說上海地下抗日工作人員如何勇猛地炸毀日軍汽車，使得日軍人心惶惶。對於這些實際參與抗日行動的烈士，魯誠心有所感的說：「每當我聽見他們這般單槍匹馬，縱橫奔馳於侵略者盤踞的總本營，出生入死地，為祖國民族的生存，為正義自由的奮鬥，那麼壯烈無畏底犧牲和活躍，這真是使我興奮得感泣了起來。」（頁131）或受魯誠影響，林矣平也向他分享自己曾親眼看到無論日軍如何威脅利誘遭捕的

游擊隊員，那名青年卻堅持不願說出同伴的動向，以至於最後被日軍用大石頭砸爛頭顱。眼見如此，連那些日本士兵都不禁感嘆：「中國也有這樣至誠愛國的青年！」（頁132）

至於在魯誠方面，秉持著投身抗戰的信念，當他再次回到中國時，亦將抗戰工作奉為第一任務。懷抱著這樣的心情，他對於中日如火如荼的戰事，自然憂心忡忡。於是，李榮春在文中也透過魯誠寫了許多日軍在戰爭中以「共榮」為掩飾的例子。例如，當魯誠要從挹江門進城時，他看到日本憲兵正神氣的檢查往來車輛與旅客的行李，城牆旁還貼有「建設東亞新秩序」、「中日親善，提攜合作」的標語。不過，對照提著軍槍威嚴神氣的日本兵，以及垂頭喪氣對日本兵小心翼翼點頭致意的中國旅客，李榮春寫道：「兩旁城牆塗著同樣的標語。其實這些除了對於現實的諷刺，還有什麼作用呢！」（頁102）此外，李榮春也在文中寫了一則關於上海日本報刊上的報導，裡頭說日軍在進入租界後不僅將各處英文改回中文，同時宣布取消租界，並成立中國人組成的議會。對於這些舉措，報導指出：

只就從這一端，便很顯而易見地可以明瞭，大日本帝國這次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那是要從亞洲的天地，驅逐出侵略的惡勢力，使亞洲的各民族，能從惡勢力的壓迫下解脫出來。俾能獲得真正自由幸福的保障，然後才能協力建設東亞共存共榮的新天地。足見大日本帝國為這種光明正義的目標，正勇敢地繼續在犧牲奮鬥。所負的使命既堂皇而又神聖的。這同時證實日本精神，和日本民族，是優秀偉大的。（頁274）

藉由這則報導，李榮春向讀者展示了當時日本如何以所謂「捍衛亞洲」、「維護和平」以及「大東亞共榮」樹立自己發動戰爭的合法性，卻無視於自身的侵略者身分。這番言論對像柳君或是王也禮等對戰爭無真正認識的人物而言，或許還能產生影響，但在魯誠眼裡，他一眼便看穿這又是日本偽善的話術，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批評：「假如將來的歷史，還如此謳歌他們，這時代的正義便永再無從伸張了，那罪惡便可帶上假面具，永遠欺瞞人類的耳目。」（頁274）可以說，藉由主人公魯誠對戰爭敏銳的認識，李榮春狠狠地在文中揭開日本以

「共榮」為名的假面。

歸根究柢，李榮春認為日人之所以如此，實乃與其民族自幼所受教育相關，因而文中魯誠指出，日人從小被教育自己是接受天照大神三種神器的民族，是富有統領人類的天孫後胄，所以本來就比其他民族尊貴優越。對此，魯誠批評：「這種優越神秘的思想，結果竟把一個民族，驅陷於這般頑戾愚昧底自我陶醉的迷信的深淵裡！」（頁110）進而魯誠得到他的結論：

於是他們的血液裡，好像都會感覺有著這種神蹟的高貴，所以便自以為他們的民族，已先天的賦有這種征服人類的神與權利。至於其他所有別的民族，卻是下賤卑劣，命定應被征服，為優秀民族的奴役。這些頑固無智的思想，結果便把他們養成了這等優越驕橫的自滿，卻自以為這是一種天賦與他們民族的優秀品質的特徵，畢竟越覺值得驕傲了，然後推而廣之，侵略的野心，便更成為他們這種發揚神諭的，傳統的神聖義務了。因而為侵略當炮灰，便是日本精神最完美的表現，也就是大和魂最高峰的完成，自認為堪受人世讚美之極了。（頁110-111）

藉由這番評論，李榮春一方面透過魯誠之口道出其對日本民族性格之觀察，也為日本為何選擇以「共榮」作為宣傳工具，卻又不將對其他民族之侵略放在心上，從其民族精神教育的角度做了透澈的分析。筆者以為，這點在1950年代兩岸當代戰爭文學中是難得的表現。亦即，儘管抗日戰爭是當時兩岸文學中的熱門主題，多數作家若不是從彰顯抗日英雄的精神著筆，就是致力描寫戰爭下悲苦的中國人民，對於日軍的描寫往往流於殘暴、冷血等僵化概念，而鮮少從心理精神層面分析日軍的侵略行為。因此，李榮春這番分析，在當時兩岸戰爭文學中無疑是少有的存在。

與此同時，強烈的中國認同在這個時期亦為魯誠帶來痛苦與挫折。痛苦在於，每當魯誠因台人身分而被以「日僑」待之時，他便產生認同上的痛苦，同時覺得愧對祖國同胞。例如，魯誠有一回在下關火車站看到日軍把其他中國旅客的行李全翻出來檢查，他覺得這些旅客已因監視失去了人格的自尊，其痛苦地想：「我們已失去了人類的自由與平等了！我們竟已面臨著奴隸悲慘不幸

的境涯！那殘暴的壓制的皮鞭，在抽擊著我們！」（頁100）由是，儘管魯誠自身因殖民地身分所以被要求走日人檢查通道，他仍為眼前的景象感到悲哀。正因如此，魯誠基於國族認同其實百般不願走日人檢查通道，那讓他感到可恥。同樣的情緒也出現在林矣平邀請魯誠一同到壽縣生活時，由於魯誠知道林矣平他們的生意乃與日軍合作，因此對於是否同行感到猶豫，魯誠說：「想著祖國，被侵略者這般蹂躪，我怎麼能夠與侵略者合作呢！怎麼還能笑著同他們說話呢！這的確會使我更痛苦，對他們日本人我連一句話也不高興說。」（頁150）由此可見，堅毅的祖國認同，使魯誠抱持與其他夥伴截然不同的態度，舉凡任何有損中國尊嚴的活動他都不願屈就。

另一方面，台人身分不只為魯誠帶來認同上的痛苦，也使他參與抗日工作的計畫受挫。魯誠原欲隨中國愛國青年到重慶參加抗日工作，不料他們的地下工作站遭到日軍破壞，夥伴們也就各自失散。在那之後，魯誠每日都期待能再遇到那群夥伴，這麼一來才有人可以引介他到重慶工作。到了壽縣後，某日魯誠突然在路上撞見當初的其中一名夥伴，卻發現對方不斷地閃避他。魯誠於是鏗而不捨地追上對方，並詢問那人為何一直以來都沒有其他夥伴聯繫自己。對方原本想用言語搪塞魯誠，最後經不起他一再質問，才說出事情的原由。原來是地下抗日人員對魯誠來自殖民地台灣的身分有疑慮，所以並不信任魯誠的抗日決心，那人說道：「總而言之，是恐怕你們台灣人已經被日本統治四十多年了，自然與日本有著相當關係，萬一替他們當走狗，或者是當間諜，那就糟糕了，上面的看法是這樣的。」（頁207）殖民地身分竟成為魯誠參與抗日工作的阻力，這點使魯誠發出悲痛的獨白：

唉！我的天哪，我這顆赤裸裸的心，想獻給祖國，竟然得不到信任。難道，每一個台灣人都會當走狗嗎，雖然有一部分人為了賺錢，利用日本勢力狐假虎威地穿起日本衣服。不過，他們有的是為著生活不得不這樣，也有的是被迫那樣做的。這也不能算是走狗呀。這是離開了祖國懷抱以後，每一個台灣同胞所遭遇的慘痛命運，連祖國同胞也不能了解這一點，多麼痛心呀！若果不是滿清政府無能，竟不顧台灣同胞的反對把台灣割讓給東洋鬼的話，我們怎麼會吃了四十多年的痛苦呢？可是，一

大群台灣同胞都在台灣受不了日本人的壓迫，才設法來到祖國的。像我這樣從家鄉抱著這顆熱忱的心，跑到這裡要為祖國抗戰報效，然而不為大家承認，難道台灣人真地這樣沒有價值嗎？我才不相信呢。（頁208）

藉由這番悲憤的獨白，李榮春展現了抗日戰爭期間，台灣／台人作為殖民地／被殖民者，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尷尬地位，一方面是日本對台灣的差別待遇與壓迫，一方面是中國對台灣的不信任與不諒解，這使台人感受到雙重失落。這樣的心情無疑是許多台灣作家的共同心聲，尤其，對那些懷抱祖國夢前往中國的作家來說，與被日本的壓迫相比，祖國同胞對台人的異樣眼光更讓他們感到難受。<sup>16</sup> 至於魯誠在經歷這次挫折後，他也選擇以福建人身分偽裝自己。不過，其之所以偽裝自己的身分，目的不在使自己能在中國過著平順的生活，而是希望能成功加入抗日的隊伍，此中展露出堅定不移的抗日意識與祖國認同。然而，從魯誠偽裝成福建人的行為來看，這不正是一次明顯而具體的身分編輯行為？這點充分體現了時代背景下台灣人民心酸的一面。

後來，魯誠認識了芝香，並決定與她一起回到紹興，於是，魯誠再次面臨了身分編輯的抉擇。這不僅體現在他在面對芝香的母親時，原想以原鄉「漳

16 除了李榮春外，鍾理和與吳濁流也曾透過文學寫下他們的心情。鍾理和曾寫下散文〈白薯的悲哀〉，抒發自己作為祖國同胞眼中的「白薯」身懷的悲哀。文章首段寫道：「由馬關條約到九九南京受降之間，時間是長或短，那是不難知道的。這時間，就這樣剖開了，或沖淡了他們之間的血源嗎？那更是不難知道的。」可以見得，在作家心裡，他對於台人與祖國中國之間的血脈關係充滿信心。然而，正是這股堅定的信心，才讓作家對自己的祖國經驗感到失落，他說：「北平沒有台灣人，但白薯卻是有的！並不是沒有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把台灣藏了起來！」何以在北京的台灣人要把自己藏起來？作家說那正如昆蟲的保護色一般，只因為在祖國人民眼中，台灣人就是日本的「奴才」。於是，「台灣被葬在世紀的墳墓裡的……」，而「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只見歷史像游牧民族，在遼闊的大草原上徬徨著。祖國——但一陣西伯利亞冷風吹來，什麼都不見了，都沒有了。」失落的祖國經驗，終使作家只剩下迷茫、悲哀。吳濁流則在其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寫到，當主人公胡太明到東京留學時，中國同學會的廣東人陳某一知道他是台灣人後，其臉色大變，之後會場皆竊竊私語：「台灣人？」、「他是間諜吧？」到了中國後，曾姓友人也要胡太明注意在當地的言行，其言：「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受這種待遇是很不公平的。可是還有什麼辦法？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不是天生的『麻子』，我們為建設中國犧牲的熱情，並不落人之後啊！」後來，胡太明因為台人身分被懷疑是日本間諜，遭到首都警察廳逮捕。在學生的營救下，胡太明逃出監獄，偷渡回到依舊受日本壓迫的台灣。胡太明滿懷希望前往中國，卻又狼狽地回到殖民地台灣，其命運就像個孤兒，呼應作家以題名《亞細亞的孤兒》指稱台灣的用意。以上引文分見鍾理和，〈白薯的悲哀〉，《鍾理和全集3》（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12），頁1-9；吳濁流著、張良澤譯，《亞細亞的孤兒》（新北：遠景出版社，2009.02），頁77、120。

州」作為代替自身「台灣人」身分的掩飾，還關係到他自己如何安置自己那顆想要參與抗戰的心。對此，早在下決定之際，魯誠便如此告訴芝香：

至於我跑到你的家鄉，不是這樣我的一生就算了呢，因為我曉得自己的力量還不能發生有什麼作用，我覺得我自己還是需要用功，對於自己人生的目標仍需再做繼續的奮鬥，希望將來對於人類，對這時代能有一點作用的可能。無論怎麼樣我是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同胞，無論怎麼樣我是決定要以我的一生和這殘暴的侵略者決鬥到底。（頁335）

足見，在魯誠心中，投身報國的決心不變，然而面對時局以及自身的困境，前往紹興成為他當時認為最好的選擇。透過這樣的身分變換，魯誠希冀能為後續的行動提供更多可能性與動力。

進而，誠如筆者前文所述，每次「身分編輯」的結果必然與後續的生活相結合，因而讓文本人物在接觸到新事物產生新的觀察與想法。於是，作家描寫魯誠待在紹興王壇時曾遇到來自漳州的郭姓「和平軍」，郭姓士兵表示自己乃因不得以才加入「和平軍」，卻未曾幫著日人欺負當地百姓。這種不得已而為之卻又有所不為的態度，恰好體現了人物身分複雜的組成元素，說明「身分編輯」內部各種力量的拉扯，而我們所看到的正是拉扯過後的結果。後來魯誠又遇見另一群「和平軍」，那群軍人也表示他們將出發到福建，並與當地中國軍隊結合，一同反擊日本帝國主義。「偽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形象與定位向來較為尷尬，然而李榮春卻能以其觀察看到「偽軍」難為之處，甚至展現他們抗日的一面，這在台灣文學中實屬少有的表現。當然，李榮春除了描寫「偽軍」的抗日意識外，也寫到魯誠回到上海後，看到淪陷區的中國人如何學起侵略者的態度欺侮自己的同胞。透過這些觀察，李榮春試圖以非單一化的形象書寫戰火下的眾生萬象，表現出筆下人物的多樣性。是故，筆者認為《祖國與同胞》的寫作特色之一，乃在於李榮春善於描寫各文本人物之間程度不一的抗日意識，以此突顯人性的複雜度。並且，李氏在書寫時雖以抗日意識為主軸，然而其筆下每個人物並未淪於平面、樣版化，他掌握了文本人物進行身分編輯時內心深處幽微的心理活動，使得每位人物都難以簡單定位。

#### 四、終戰前後的上海：戰火浮生與未完的身分追尋

最後，戰火還是蔓延到紹興鄉下，於是魯誠向芝香提出再到上海的要求。從後來的歷史發展可知，魯誠回到上海時已經接近戰爭的尾聲，而日軍正在中國做最後的侵略。在此情境下，加上上海的都市環境，讓魯誠觀察到了其它事物，李榮春於此也從具左翼色彩的視角展露他對戰時中國社會的觀察與關懷。文本較關鍵的左翼視野仍在於李榮春能看到在帝國主義剝削下變形中的戰時中國社會，這又可分為兩個方向，一是文本人物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另一則集中在魯誠的工廠生活。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李榮春注意到社會貧富差距正日益擴大。於是，他針對帝國主義侵略與中國經濟之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寫到，當時大部分配給的物資都不是賣給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因為這些百姓已被壓迫至喪失購買能力，於是貨物便由商人賣給走販，再由他們偷運至抗戰區銷售。為了順利運貨，這些走販必須連絡「和平軍」幫忙才能在夜裡遞送出去。可想而知，這些由日軍剝削而來進而分配給各洋行的物資，在歷經層層關卡後，必定拉抬了中國社會的物價。在文本中最明顯的便是米的價格。最初林矣平的妻子向他抱怨時，那時的米價剛從九塊錢一斗漲至十六塊錢一斗，到抗戰後期一斗米卻已漲至二千元。除了因日本剝削而造成物價飆升外，文中還提到由日本扶植的汪精衛政府也自行發行「偽鈔」，破壞了中國國內幣值行情，使得人們漸漸失去對鈔票的信賴。於是李榮春寫道：「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開始殘暴的摧殘以來，那物價便就一天天無止境似的暴漲起來，一般民生便都不能再安定了，而且一說到鈔票，大家便像談虎色變似的，覺得不安地駭怕起來，這暴虐的侵略者帶給人類生存的恐慌，這種普遍的痛苦真是太深刻了。」（頁840）

此外，日軍甚至也不讓中國人民擁有住的權力，文中寫到，每當日軍攻占一地，日僑們便一窩蜂地趕到該地，憑藉著日軍的許可占領民宅，「享受他們那種征服的民族的驕傲與優越的權利」（頁875）。是故，從個人失去安身立命的住所，到整個社會物價的飆漲，李榮春發現這全源自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亦即在日本共榮的假面之下，其真正的戰爭目的之一，乃欲透過此

舉榨取中國的經濟資源。在此情況下，活在戰爭下的中國人民莫不感到龐大的經濟壓力。於是，部分生活在淪陷區的中國人開始變得心理偏差，紛紛學起日人的態度來剝削自己同胞。例如，魯誠曾看到鐵路局的職員向每位等車的同胞索取過路費，甚至還因為認定某人給的錢與所攜貨物不成比例而為難對方，看到這般景像魯誠心想：「原來這些在侵略者的壓制下，當了一個鐵路局職員，得著的就像狗似的待遇，只一點微薄的薪金，然而物價只見一天天無止境還在暴漲，這怎麼叫他們把生活維持得過去呢，所以就得出這一個辦法，藉以搶救他們生存的恐慌，那侵略者便閉起一隻眼，只當這就是中國人榨著中國人自己，卻以為與他們無干了。」（頁946）從左翼視角出發，李榮春清楚地指出戰時中國社會中同胞相互剝削的原因，那便是人性在帝國主義經濟壓迫下的異化，可怕的是，始作俑者卻又裝作一副與他毫無干係的模樣，默默助長被侵略民族的內部衝突。

至於戰爭對各項建設的破壞，也使得當時中國街頭出現大量的流浪者，他們坐在馬路旁，用粉筆寫著自己悲苦的身世。至於在巷弄裡，還有更多已失去求生本能的人們，李榮春認為這些人雖然未死，但死亡的殘忍已使他們的臉形產生變化，並形容這些人都是「沒有到死就變成了鬼」（頁928）。而這一切，都起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摧殘，因而造成這般「人間煉獄」的景像。文中魯誠提出如下結論：

因為這種帝國主義的暴力蹂躪的結果，越發竭盡著征服者的野心無厭的壟斷，再加放刁把濫，驕橫狡黠，操縱種種惡辣不義的優越權利，以一種強盜的殘橫壓迫，剝盡了被蹂躪下的同胞膏血，以這種不厭的欺壓蹂躪，逼迫得中國人都幾乎無法生存下去，跟著社會經濟的崩壞，財富集中，貧富一天天愈趨懸隔，結果這許多悲慘不幸的同胞，可憐天就越發前仆後繼，一天天愈見激烈在增加起來。（頁929）

羅伯特（Robert J. C. Young）指出：「人們原本用『帝國主義』描述領土被宰制時的政治系統，它的原本意涵不一定有批判的意味；但是相較之下，後來

『帝國主義』變成廣義地指經濟宰制，這個新意義就隱含了批判的角度。」<sup>17</sup>在羅伯特的脈絡下，其所謂「帝國主義」意涵之轉向，主要是針對二戰後美國以帝國之姿干涉全球經濟所提出的批判。儘管如此，筆者認為羅伯特的看法亦適用於二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正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曾指出：「在大西方帝國的擴展中，利潤與持續獲利的希望，顯然無比重要，百年以來，香料、糖、奴隸、橡膠、棉花、鴉片、錫、黃金和白銀的吸引力即是證明。」<sup>18</sup>是故，日本作為東亞受西方勢力侵略後首個帝國主義國家，其目標非但與西方國家無二致，甚至，其所謂「大東亞共榮」概念更有取代西方勢力獨占東亞資源的野心。在此情況下，日本自然不會輕易略過物廣地博的中國，而是如李榮春所述那般竭盡所能地進行剝削。可以看到，李榮春在書寫時並未引經據典的使用左翼理論，因而其分析只能是一種個人觀察結果。然而，在其細膩的觀察中，我們不難發覺李榮春乃是以一種左翼視野看待當時的中國社會，因而才能看到問題之關鍵所在。這種出自左翼視角的觀察，也反映在魯誠的工人生活中。

在魯誠與妻子芝香重返上海後，受迫於生活壓力，魯誠只得到日人的足袋工廠工作。可見，在不違背其祖國認同的底線的前提下，生活中的經濟壓力成為魯誠在當時從事「身分編輯」的重要考量。工廠裡的男工，20人一房，睡的是箱子墊著木板的床，棉被須自己準備，吃的是發霉混著石子的米。由於一個月賺的錢還不夠買一斗米，工人們索性都待在廠裡不回家，因為回家又是另一筆開支，而待在廠裡至少有雖不好吃，卻能免費吃到飽的米飯。至於女工，除了配給及少量混著石子的米，工廠並未提供住宿，薪資更比不上男工。然而，作為被侵略的民族，李榮春筆下的這群工人就這麼概括承受著，失去反抗的權利，只求一日溫飽。文中尚提到上海縫製廠，那是家軍需用品工廠，這樣的一家工廠在李榮春看來，其諷刺之處便在於裡頭「所縫製的都是侵略中國殘殺我同胞的日本皇軍的戎裝，至於這許多不顧這種炎熱的逼迫，還是默默辛苦在勞

17 Robert J. C. Young（羅伯特）著，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01），頁27。

18 Edward W. Said（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6.02），頁43。

作的，就是我們不幸的同胞。」（頁998）為了生活所需，受侵略的民族竟還得為侵略者縫製殘害同胞的軍衣度日，此景充分展現帝國主義剝削力量的無孔不入。

與其他工人相比，魯誠雖因通譯身分享有較好待遇，然而在發薪日，面對還買不起一斗米的薪資，魯誠深感侮辱與諷刺，他無法相信這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工作一個月的報酬。進而，魯誠在憤怒之下想到，他的遭遇實際上是當時所有同胞的共同經驗，他認為所有中國人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令人絕望痛苦的記憶，甚至，他希望所有人類及其後代都不會忘記這個因帝國主義剝削而造成的不幸。此外，魯誠也發現工廠裡的日人亦帶著侵略者的驕傲，因而總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中國工人，中國工人毫無尊嚴可言。比如，每到下工時間，中國工人就必須在廠門排隊接受檢查，等待門房將全身摸遍確認沒有私帶廠裡產品後，工人們才可以離開。門房雖亦是中國人，一旁卻有日人監視著，因此一點也不得放水。某日，幾名女工偷帶布料被發現，日人竟將她們的衣服扒光，要她們赤裸裸地跪在一萬多名中國工人面前，以此作為警惕。眼見此幕，魯誠心想：「做了奴隸畢竟一個人還不能吃得到飽，偷了只這一點東西靈肉同時就得遭受到這般凌辱。這只屬於她們自私的恥辱嗎，這次一種民族的奇恥大辱！人類的恥辱！20世紀的恥辱！」（頁1014）然而，生存的意念卻是支持中國工人忍耐的動力，然而李榮春認為每個人「都暗暗在心裡迫切地祈禱著祖國的趕快回來，解救他們這種悲慘無望的痛苦」。（頁1017）

更甚者，文中的日人不僅不給中國工人尊嚴，對於他們的性命更視如草芥。李榮春在文中寫到，當上海遭受空襲時，上海縫製廠的日人不但沒讓工人們疏散，反而要他們等待警報，日人們自己卻先逃了，還從外頭將工人們鎖在廠內。最終，十多名女工被壓死在倒塌的茅廁中。對此，李榮春悲痛地寫道：「然而廠門還是關著，打外邊還下著鎖！」（頁1114）不過，日人對此顯然毫不為意，隔幾日空襲再起時，日人仍將中國工人鎖在廠內，而且這一次更讓他們暴露在廠房外的空地。李榮春寫道：「那些東洋門房只管還站在門房裡，一看著這許多支那奴隸，這般恐怖而焦躁地擠著一團蠢動著，好像就會感到非常極度的厭惡起來，就越發竭力地擺出那副征服民族的優越神聖的威嚴，同時

還閃爍著那種極度殘酷的輕蔑的眼光，驕橫地正在掃視著這些奴隸。」（頁1117）接著，這些日本門房竟冷酷地說：「大家都不要急，飛機不會這樣快就到，還得一個一個查過身體才准跑出去。」（頁1117）筆者以為，相較於冷血形象，李榮春於此嘲諷日人的意涵應該更大。在帝國主義的異化下，這群日本門房不僅不顧工人們的生命，自己也還堅守在崗位上執行任務，深怕損害到任何一點關於侵略者的利益，也難怪李榮春會以「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忠實無智的門犬」稱之。但是在這次的空襲中，或因有了前一次的經歷，男工們不顧一切地去拽開大門。對此李榮春認為，這乃是一種出自求生的迫切慾望，因而工人們對於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能再屈服，亦可說，在延續生命的動力下，工人們終於體悟到團結抵抗的重要性，所以都不願再當任人擺布的奴隸。不過，李榮春並未過度放大這股力量，因為在這次反抗中，仍有十多名女工死在眾人混亂的腳步下，這也映襯了這股反抗力量在形成背景方面，本就是一場悲劇。

後來，在一場與日人佐籐的衝突中，魯誠決定辭去工作，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看到佐籐這類從軍隊下來的人，總是鄙視廠裡的中國工人。最後，在日人蒲田的勸說下，魯誠轉任針廠工作。筆者以為，魯誠之所以願意到針廠工作，除了因為他發現針廠內多數日人與中國人相處融洽外，主要可能還受到蒲田以下言論的影響。文中，當蒲田勸魯誠時說道：

至於針廠那些日本人都是廣島福助本廠派到這裡來的技術家，關於製針的技術都是有過幾十年的經驗，他們只是要到這裡把製針的技術教給你們中國人，以後中國人都學會了，他們便又要回國去了。原來他們都是老頭兒，所以都不想要住在大陸。因此我希望你還是認真跟他們研究，把製針的技術趕快統統都學得會，將來這針廠都是要讓你們中國人自己弄的，一到了那個時候這針廠便就成為你自己一個人的天下了。（頁1036）

雖然無法判斷蒲田講這段話時的真實想法，然而從魯誠後續的表現來看，他確實將製針技術當成他「身分編輯」的重要考慮之一，其看重的乃是從日人那習得製針技術，日後好以此建設祖國。因此，當他在針廠發現的中國工人在終戰

前夕開始倦勤，魯誠如此勉勵偷懶的同胞們：「我希望你們都要有得研究的熱情才好，並且你們要想做的到這裡來學習一種技術，希望能把技術學得好起來，等祖國勝利，我們才會有得技術，可以為新中國的建設努力。我們這時在這裡就要這麼想，這樣決心，大家要認真學習，希望將來能為我們的國家努力，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國。」（頁1208）是故，為了生活，魯誠不得不到日人工廠工作，支持他在此困境下待下去的便是其對祖國未來的熱望。並且，魯誠這股建設祖國的決心並未隨著抗戰勝利而消逝，因而對於戰後針廠萎靡不振的狀態，他也感嘆萬千，深覺對不起祖國。

最後，魯誠在戰後因與針廠幹部起衝突而被解職，因而只得回到台灣。過去魯誠等人不願意回台灣，乃是因為那裡已是日本殖民下的煉獄，但如今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這便增添了魯誠想回去看看的意願，他對旁人說：「我想回去看一看，現在台灣已是回到祖國的懷抱了。」（頁1286）可見，正是因為台灣已重回祖國，魯誠才願意回鄉發展。此外，魯誠還賦予自己這樣的使命：「我想台灣同胞隔絕了祖國這五十多年，他們對著祖國的文化都很生疏了，這趟我們回去希望能給他們早一點理解祖國文化的價值，這樣才能真正認識祖國的偉大，這就是從中國回去的我們所應自覺的使命。」（頁1287）對此，朝枝卻說：「嘿嘿，光復……我聽說已經許多外省人統統都跑到台灣去了，我們又沒有什麼背景，回到台灣還是沒有什麼辦法，看起來我們的命運永遠是奴隸！」（頁1287）事實上，朝枝的這番話應是李榮春當初回到台灣後因見證了島內省籍衝突有感所寫，但考量到寫作當下的台灣社會環境，李榮春也只是點到為止，並利用另一番言論進一步突顯魯誠的祖國認同。於是，文中雖然描寫魯誠在聽到朝枝的話後，像是想起過去因台人身分被質疑的傷痛，因而陷入短暫的失落中。不過，魯誠卻立刻甦醒過來，並向眾人表示祖國一定會像疼愛嬰兒那般照顧台人，所以他希望台人不要聽信那些懷疑祖國的謠言。進而魯誠還說：「這幾年戰亂我們許多人跑到中國來有些還幹了許多事情對不起祖國；但我們這時還能在中國自由闊步，祖國既然不曾追究我們的過去，祖國同胞不但不曾輕蔑我們擯斥我們，而且還對我們這般寬容和溫暖，唉！我們是不能再說什麼了，我們不能再對不起祖國了，祖國的對待我們是太偉大！太慈愛

了！」（頁1288）由是，魯誠便懷抱著這樣的心念回到台灣，李榮春則在文末再以魯誠的獨白寫道：「沒有愛的生命是空虛的，我的愛是廣泛的，我永遠愛我的祖國與同胞！！」（頁1290）以此為魯誠貫徹全文的愛國意識與祖國認同作結。然而筆者認為，最後這種幾近空泛、樣板、教條與宣傳意味的結尾，以及對於戰後台灣社會在描述上的戛然而止，彷彿都在述說著，關於台灣人民的身分編輯尚未結束。

#### 四、結語

本文以李榮春《祖國與同胞》為研究對象，討論文本中的「身分編輯」與「戰爭觀」。作者李榮春在後記寫道：「我民國27年4月到中國去，親眼看到在抗戰期間中，祖國的困苦命運，同胞的慘苦遭遇。也親自賞飽日軍殘忍的暴行。因此，我流浪在中國的八年期間，腦海裡不時起伏著『祖國』與『同胞』的字眼，同時，他們交織成為烙印，深印在我心中，永遠拂不掉。」（頁1291）因此，顯而易見地，「祖國」與「同胞」成為貫穿全著並充斥於文本各處的關鍵詞。筆者以為，是「戰爭」進一步激起了李榮春對於祖國與同胞的關愛，而其關愛則分別表現在抗日意識、祖國認同與左翼情懷等方面，這三者之間也因「祖國與同胞」這個命題相互結合起來。然而，從前文的討論，筆者也發現李榮春的作品雖完成於1950年代，事實上卻與同時期的反共文學並不那麼相似，其源自殖民地台灣的視角造就其特殊的創作視野。

從「身分編輯」的角度，筆者以為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並理解台人在當時於身分認同與個人目標之間的拉扯，在不同的考量下，每個人都「選取」、「刪除」與「排列組合」了自己所需或是想迴避的部分，以自己覺得最適合面向世人的樣貌出現，展露「認同」的複雜性。而從主人公魯誠多次進行身分編輯的例子來看，說明人們在此過程中通常無法一次到位，也不能一意孤行，而須透過無數次與外在環境的協商，達成最後的編輯目標，這點也體現了在身分編輯過程中，人類心靈的彈性與韌性。不過，從魯誠返台前那種壯志未酬的狀態，也使我们明白人的一生即是由不斷的身分編輯所構成，因而關於魯誠與台灣人在身分上的追尋仍未結束。

在戰爭的視野下，李榮春看到了人們抗日意識程度不一的多樣性，更看到帝國主義以戰爭作為手段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剝削，在抗日反戰的戰爭觀之外，尚從具左翼色彩的視野具體分析戰爭與帝國主義經濟之關係。因而，從戰爭文學的角度，筆者認為《祖國與同胞》雖然鮮少談及戰場上的拼鬥，卻對戰時中國社會與台人活動有深刻且細膩的描寫，因而應被視為一部再現二戰期間中國戰場的重要作品。而從兩岸1950至1960年代戰爭文學的表現來看，《祖國與同胞》因其對人物性格的多樣性，以及對二戰期間台人在身分上所面臨的尷尬處境皆有細膩的書寫，所以在眾多作品中顯得獨樹一格，其對戰爭多層次的觀察亦極具深度，以致其精神高度甚至掩蓋了作者本身在文字運用與寫作技巧上的不足。<sup>19</sup>為此，筆者以為《祖國與同胞》是兩岸從文學觀看抗戰歷史時，不可忽略的代表作品。就目前看來，這部小說在完成時乃至現今似乎都還未獲得其在台灣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這或許正是彭瑞金呼籲應該還李榮春文學公道的原因。<sup>20</sup>藉由對李榮春與《祖國與同胞》的重讀，筆者以為李榮春文學的貢獻乃在於文本所傳遞的精神高度以及其對人物形象複雜度的充分掌握，這使這部小說不僅在字數上取得空前的成績，更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不容抹滅的宏偉身影。

19 這點李榮春自己在後記也承認：「我不是擅長寫作的人，我的文筆幼稚，因此不通順的地方頗多。」（《李榮春全集1：祖國與同胞》，頁1291）。

20 在彭瑞金看來，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是一部空前未有的大作，因為「李榮春可以說憑藉自己九死一生的和中國鄉間人民一起的『抗日』經驗寫成的八十多萬字的小說，基本上已創下了以個人史為軸心寫作長篇巨著的特例，尤其是這個人物，是完全沒有任何官銜職務的典型的『庶民』。」然而，這樣的一部著作在當時卻無法參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評獎，而只給予一萬六千元的寫作補助。對此，彭瑞金認為：「我深信『文獎會』一定是忌妒李榮春寫出了連他們這批自命不凡的戰後台灣文壇的『指導者』都無人能及的『偉大』著作，不肯玉成其事，才會推託說是要將來帶回『祖國』給四萬萬『同胞』看。」而彭氏更認定：「《祖國與同胞》讓這些『指導者』顏面無光，也註定了李榮春要一輩子走他的孤寂的文學獨木橋。」同樣從1950年代國民黨在台文藝體制著眼，筆者於此尚欲就《祖國與同胞》之內容，為其未能參加評獎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首先，根據前文的討論，我們可發現《祖國與同胞》在寫作時雖滿足了國府書寫抗日主題的文藝方略，其書寫卻也具有濃厚的左翼情懷。尤其，他在小說中還大量書寫魯誠的工人生活，這些在國府的文藝體制下都屬禁區。由此觀之，在國府的創作標準中，事實上《祖國與同胞》並非所有內容都能過關。後來，李榮春自費發行的部分也只有全文的前四分之一左右，而具左翼情懷與勞工內容的都在後半部，因而也就沒有傳播左翼思想的危險。其次，李榮春在文中對於台人與中國同胞之間的隔閡有所著墨，他雖在小說的最後透過魯誠說了一番中華民族不分省籍你我的論述，文本中的省籍矛盾卻已隱然存在。筆者以為，以1950年代台灣政治環境而言，國府並不樂見這類表現省籍隔閡的作品出現，因為這有可能形成其統治上的阻力。是故，筆者認為《祖國與同胞》之所以遭到婉拒，除了彭瑞金所推測的原因外，將文本內容與1950年代台灣文藝環境一併討論，應可得到更多可能性。參見彭瑞金，〈李榮春全集序〉，《李榮春全集1：祖國與同胞》頁6-8。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吳濁流著、張良澤譯，《亞細亞的孤兒》（新北：遠景出版社，2009.02）。
- 李榮春著、彭瑞金主編，《李榮春全集1：祖國與同胞》（台中：晨星出版社，2002.12）。
- 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12）。
-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3》（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12）。
- E. M. Forster（佛斯特）著，蘇希亞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商周出版社，2009.01）。
- Edward W. Said（薩伊德）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6.02）。
- Robert J. C. Young（羅伯特）著，周素鳳、陳巨擘譯，《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6.01）。

### 二、論文

#### （一）期刊

- 丁世傑，〈回歸母土：論李榮春小說的母親主題〉，《台灣風物》59卷3期（2009.9），頁129-171。
- 李麗玲，〈「真實與虛構」——從人物論李榮春的文學世界〉，《宜蘭文獻雜誌》31期（1998.01），頁3-14。
- 林芳玫，〈謝雪漁通俗書寫的跨文化身分編輯：探討〈日華英雌傳〉的性別與國族寓言〉，《台灣文學學報》23期（2013.12），頁29-62。
- 唐毓麗，〈私小說的紀實與省思：談《祖國與同胞》、《海角歸人》與《洋樓芳夢》中的自我形象及愛情書寫〉，《文學台灣》92期（2014.10），頁196-235。
- 褚昱志，〈台灣大河小說之先驅——試論李榮春的《祖國與同胞》〉，《台灣文學評論》5卷3期（2005.07），頁84-106。

#### （二）學位論文

- 江靜怡，〈李榮春小說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吳淑娟，〈以生命和文學共舞——李榮春自傳性小說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周介玲，〈台灣作家的文學獻身之道——李榮春之藝術家成長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陳凱筑，〈論李榮春及其小說〉（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三）研討會論文

藍建春等，《李榮春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李榮春百歲冥誕研討會」（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文學台灣基金會主辦，頭城李榮春文學館協辦，2014.05.03）。

